环球瞭望

2015年欧洲经济何处去

□陈江生

最近世界经济中的大事几乎都发生在欧洲。1月22日，欧央行决定实施量化宽松。从2015年3月起，欧央行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国债和其他债券，并声称这一行动将持续到2016年9月或通胀回升到2%左右为止。接着，1月25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再次揭开了希腊问题的魔盒，两个月来，希腊新政府围绕希腊债务与欧盟火药味十足地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不断发出退出欧元的威胁。与之相伴的，欧元一路下滑，鼓噪欧元崩溃的声音再度响起……那么，2015年的欧洲经济会如何发展？会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呢？

过去二十年，欧洲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是向下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等要素的增长趋势总体上也是向下的。因此，发展的速度总体变慢，是欧洲经济的大趋势，过去二十年是这样，2015年、未来的十年也仍然会是这样。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还有一些因素直接决定着欧洲2015年经济成长的表现。

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是变化了的世界实际财富格局对自身所对应的世界虚拟财富格局的强行纠偏。总体表现为通过危机调降美、欧、日虚拟财富的比重，提升其他经济体的虚拟财富比重。由于危机始于美国，因此美国首先受冲击，当然也是最先进行调整的经济体。虽然受损严重，但毕竟是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凭借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力，通过把危机的冲击力转移给全世界，2014年率先走出了谷底。这就意味着美国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开始变化，不再与欧洲、日本同向了。也意味着美国的调整基本完成，主要的调整压力加到了欧洲经济身上。为了缓解压力，推进调整，欧央行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于是，有了欧央行的量化宽松，有了欧元兑美元的汇价一路向下。2015年，欧元的量化宽松当然能够稍稍缓解欧洲经济的下行压力，但是只要欧洲在世界虚拟财富格局中份额高于其在世界实际财富格局中的份额的状况得不到校正，危机的冲击还会一波接着一波；只要基本的经济要素不发生变化，欧洲经济增长缓慢，在世界实际财富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就是必然的。

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欧洲的内部治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欧洲已经演化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用于规范从生产到分配，调节国内各利益集团、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但是，欧盟的发展却试图抹杀这一套制度为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保留的差异性，于是有了希腊债务问题和齐普拉斯政府。如果希腊没有纳入欧元体系，希腊经济出了问题是可以通过包括本币贬值等方法来调节的；希腊人再艳羡比自己更发达国家的人的生活水平，也没人会借给他们那么大数额的债务。但是，希腊加入了欧元，希腊人当然认为在经济上自己与德国人应该没什么差别了，债权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借钱给希腊就是借钱给欧元的错觉的。因为，在同一经济体内，是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在同一个国家里，本来政府债务由中央政府处理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但是，希腊毕竟和欧元区其他国家不是同一个国家。德国不愿意了，欧央行当然也不愿意了，为希腊冲销债务，凭什么？当然，希腊人民更不愿意，我是欧元的一分子，欧元为我冲销债务不就是为自己冲销债务吗？于是一个“两难问题”出现了。如果欧央行为希腊扛下了债务而不加以足够重的惩罚，其他高负债国家一定会仿效，欧洲金融体系将面临崩溃。如果不为希腊做点什么特别的，希腊经济崩溃了，债务违约和坏账对欧洲金融体系的冲击也非同小可。反而是希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到了现在，我该得的也得过了，该受的也已经受够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只要欧洲不能想出办法解决摆脱这一两难困境，2015年，乃至以后几年，这一问题提出一次，欧洲经济就受一次冲击。

综合前面的讨论，我们认为：虽然欧央行动用了量化宽松这一强刺激，2015年的欧洲经济仍将继续保持一贯的疲态。而且每次希腊或希腊式的问题被提出了，都会是一次对欧洲经济的冲击。

2015年欧元区将会主要以欧元和欧洲经济的疲软和疲软之中的不稳定来影响世界经济。

首先，欧元区是一个比中国更大的经济体，它的疲软将从整体上拖累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这种拖累甚至可以和美国刚推出量化宽松的时候相提并论。主要的表现包括了推低大宗商品国际价格，降低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使国际运输行业蒙受损失等等。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资源的主要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全面的冲击；而进口国将因之降低成本，推高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为了缓解危机推出的量化宽松虽然在刺激欧元区经济发展方面是正面的，但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的影响却是负面。一则，会加大世界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压力。虽然我们相信因为世界第三大货币人民币不会加入对美元的贬值，欧元的贬值不会引发世界在2015年出现货币竞争性贬值，但世界第二大货币一路走贬，冲击是可见的。二则，希腊以及可能的希腊式问题的冲击，会使欧元的贬值进程也非常不稳定，从而增大各市场参与方进行金融操作的成本，降低金融市场发现价值的效率。另外，多年来欧元区一直保持资金流动的巨额盈余，每年仅凭自然而然的交易与投资流动，就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量化宽松和希腊冲击很难说是否会导致从2015年起资金流向开始大幅变化。

2015年欧元区经济的这些变动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对我国经济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而且在其低谷，我们是可以对一些保管成本不是太高的商品进行大规模收储。第二，欧元的贬值降低了我们收购一些我们确实需要的欧元区的技术、设备乃至企业的成本，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行动。第三，欧洲的经济和货币调整，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好机会。当然，挑战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已经使得我国的石油、煤炭、金属等行业伤痕累累；欧元贬值对人民币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链 接

希腊债务危机源于2009年。当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政府财政赤字，随即导致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而揭开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由于当时除希腊外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较高的财政赤字，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也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为维持欧元汇率的稳定，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领导人对希腊实施了救援行动，条件是要求希腊采取紧缩政策，希腊政府给予了力所能及的配合，但其经济状况一直未见好转，其主权信用评级也降至全球最低。当地时间2015年2月8日，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向德国追讨二战赔偿款。根据希腊政府的要求，德国应赔偿1620亿欧元，超过希腊所欠债务总和的一半。对此，德国政府断然拒绝，但希腊政府以没收德国资产相威胁。

日本注重官民合作的多元制衡

□王 伟 刘南斗

二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了同英国类似的议会内阁制，天皇成为国家的象征。日本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制度除了树立国会的绝对权威之外，还为建立官民有机结合的行政监察制度、发达成熟的社会监督制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注重官民合作的行政监察

日本是一个行政管理相当发达的国家，政府对于行政监察非常重视。经过大量的投入和长时间的建设，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完善、有力的行政监察体系。日本的行政监察制度主要包括中央计划监察和地方监察两种。中央计划监察包括行政管理厅的监察局、行政监理委员会和行政审议会三个部门，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全盘改善中央政府的行政制度和方针政策。地方监察是指在各行政地方广泛联系当地群众，改善当地的行政。除此之外，日本还有邮政监察、人事行政监察、预算执行监察等行政监察制度。在日本的行政监察体系中，比较有特色的做法有两点。

制定行政监察计划。日本的行政监察非常重视计划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行政管理厅的监察局每年都会提出两百多个行政监察的重点课题，然后到各省厅走访调查，通过分析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来确定40至50个主要的监察课题。主要课题确定以后，监察局将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同民间知名人士交换意见，以进一步修改完善主要课题及其相关的细节。最后，行政监理委员会审议相关监察课题，形成最终的年度监察计划。由行政监理委员会形成的年度监察计划必须要严格执行，但如果临时遇有亟待解决的课题，也可以进行临时性的机动调查。

建立行政交谈制度。行政交谈制度是指：行政监察部门同那些因为行政行为而遭到损害的民众进行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尽可能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以改善现行行政政策的一种制度。日本的行政机关也通过行政交谈制度主动听取民众的“苦情”，进行自我反省，谋求自身工作的改善。行政交谈制度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地方的行政机构和特殊法人等公共企事业团体，但是它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国民监督网络，对于日本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高度重视对官民结合的行政监察制度的研究，为此，日本于1997年设立欧恩布兹曼制度研究会。欧恩布兹曼是瑞典用语，意为行政监察。该会主要由行政学、行政法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从学术上、理论上系统研究如何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行政监察制度，并向政府提出有关的建议。该会为日本行政监察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通过“官民结合”“官学结合”等做法，让专家、学者、社会有识之士和普通民众都有效地参与到行政监察当中，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系统、健全有力的行政监察体制。因此，行政监察对于日本政府和公务员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发达成熟的社会监督

二战后，日本制定的《新闻法》赋予记者采访、报道的必要权利，从立法上保障了新闻自由。如今，日本的媒体业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产业，媒体的管理主要依靠法律和行业协会自律。在日本，媒体被称为与政（政党）、官（政府）、财（财界）并列的“第四权力”，其对政府的监督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对政治丑闻的报道注重监察机关查处前的揭露性报道和查处中的推动式报道，而不是查处后的跟踪式报道。当年田中角荣首相和竹下登首相的下台就与日本媒体的揭露性报道密切相关。第二，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往往在一些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记者室，以便及时获取信息和就近监督政府。一些媒体还通过自身的各种渠道，建立了对重要政治人物的新闻监督网络，使得一些权力人物经常性地处于媒体的曝光之下。第三，一些新闻媒体经常通过多种方式，组织民众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反映民众对于政府及其决策的态度和要求。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众心中对于政府的怨气，又有利于间接地监督政府。



2013年11月30日，日本东京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

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意识到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因而改变了对民间组织一贯采取的限制和谨慎的态度。如今，日本的民间组织已经涉及环境保护、反战和平、妇女权益、社会福利、城市改造、社区建设、灾害救助、文化教育等领域，数量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民间组织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从侧面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日本有很多大型的企业联合组织、行业联合会、商工会议所等社团组织。这些社团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事关其利益的政府政策、法令等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表达自身的诉求，在一定程度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日本民众对于政治相对冷漠，但是民众的公民意识相对较强，往往可以通过行政交谈制度、担任公安委员会委员、受邀参加多种听证、参与修改法令的投票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监督。

他山之石

热点透析

编者按：3月31日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发稿，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近40个。亚投行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如何让亚投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许本文会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发。

理性看待“亚投行现象”

□陈建奇

在2015年全国两会闭幕前夕，中国财政部官网发布信息称，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确认函。美国白宫针对此举发表即时评论，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有些媒体认为美国的这种指责极其罕见，美英在国际舞台上是极为亲密的盟友关系，而在加入亚投行的意见上却出现了显著分歧，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美国的言论并没有对其他盟友起到“警示”作用，3月中旬以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大国陆续申请加入亚投行。

近期《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副财长希茨的话称，美国对能增强国际金融架构的新多边机构表示欢迎，他还提议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与亚投行联合为项目融资。美国态度的软化可能会使更多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现象”进一步引发各方关注。如何客观评估这种现象？“亚投行现象”对于中国有什么积极意义？这些问题都亟待进一步解读。

“亚投行现象”释放三大非常态

亚投行是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倡议建立的。总部将设在北京，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去年10月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同属于开发银行，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性。然而，为何亚投行会引发社会如此多的关注？归根到底，主要在于“亚投行现象”释放了三大非常态。

一是改变了中国主导建立的开发银行缺乏发达大国参与的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列入中国政府的战略规划，近年来持续倡导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然这些机构大多处于筹建阶段，但目前只有亚投行才有发达大国参加，这无疑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是催生了游离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美国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目前全球诸多国际或区域治理平台大多是由美国及其盟友来管控。不管美国有没有直接管控相关平台，其都可以通过七国集团等治理体系来确保其主导性。然而，对于亚投行而言，英、德、法、意等发达大国已经主动申请加入，虽然美国对组建亚投行的态度由之前的反对转向欢迎，但组织亚投行的却是中国，这显然游离于美国的主导体系之外。

三是调整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导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亚太经济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较长时期主导亚洲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此次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由于有诸多发达大国的介入而使其颇具发展潜力，虽然当前的资本金仍然不是很大，但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筹集至少8万亿美元资金。可见，亚投行发展空间十分巨大，未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将逐步做大做强，由此推动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的调整。

不宜过度夸大“亚投行现象”的全球影响

结合历史经验来看，发达大国加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并不少见，比如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都有发达大国的参与，发展中国家也在非洲开发银行等部分机构中拥有主导权，但这些机构已经成立运转多年，并未对现有秩序构成大的影响，也没有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

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不仅比世界银行资本低，而且也比亚洲开发银行资本总量少，亚投行从总量方面难以与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相比拟。而且，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可以说，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同时，英国等发达大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更多的是经济行为。美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呈现持续改善态势，而欧洲经济仍然没有摆脱金融危机及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欧洲经济通缩风险依然较大。在此背景下，寻求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一直是欧洲等发达大国的重要目标，通过深化国际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大国的合作，成为短期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及“一带一路”等互联互通，英国等大国加入亚投行有助于深化自身与亚洲的经贸合作，而且欧洲也作为“一带一路”的相关地区，由此可能享受亚投行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等发达大国抱团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就不难理解，此举更多局限在经济合作层面。

从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局看，“亚投行现象”更多的是暴露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亟待调整完善的问题，但从实质上并未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由美国等发达大国掌控的局面。一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拥有前沿科技水平，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等综合实力，掌控全球金融话语权，这些都决定了其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出现世界大战等外部冲击，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将极为缓慢。美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才主导全球体系，如果没有出现二战，那么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替可能还要经历更长时间。

中国应重视“亚投行现象”

虽然亚投行对全球的影响不应高估，但亚投行是中国主导构建开发银行这一公共产品的尝试，此举已经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这是世界对中国推动开发银行治理体系建设的关注，也是世界对中国大国发展的期待。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高度重视“亚投行现象”，化解潜在挑战，抓住有利机遇，稳步推动亚投行建设发展，并为更广范围内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积累良好的经验。

首先，应更加客观评估亚投行的挑战及有利条件，为未来推动其他区域或国际治理平台建设做好示范。英国作为老牌世界强国加入亚投行具有重大意义，英国的支持不仅有助于提升亚投行的综合实力，而且有望为亚投行的创建提供重要的治理经验。但美国持续呼吁亚投行应遵循环境保护及社会保障等高标准的要求，这是美国为掌控全球秩序主导权而作出的正常反应，这种现象在未来中国推动其他区域或治理平台建设中可能呈现常态化。中国在亚投行建设过程中既应重视英国的地位，也应重视理顺中美关系，而不应回避潜在的冲突，将亚投行建设好、运转好，为其他平台建设树立好的形象。

其次，在关注亚投行对外部治理机制影响的同时，也应注重亚投行对国内金融生态的影响。目前关于亚投行建设的影响讨论更多局限于外部，较少关注亚投行对国内的影响。事实上，伴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中国开发性金融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前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已经超过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总和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同时，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倡导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未来如何厘清亚投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关系，显然成为促进中国乃至区域金融生态健康运转的重要内容。

再次，应更加重视亚投行运行规则与治理模式研究，为推动开发银行等区域或国际治理体系调整优化奠定基础。“亚投行现象”引发多方关注，但亚投行的运行规则、治理模式等仍有待研究。亚投行定位于基础设施投资而非援助，但这是否意味着相关贷款将有全新的要求，如果不是，该如何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转？同时，如何让亚投行的行为既体现参与各方的代表性诉求又能保障运转效率？这些问题的破解亟待治理体系创新。